

军事历史论丛

兵家史苑

军事历史研究会主办

第三辑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事历史论丛

兵 家 史 范

第三辑

军事历史研究会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兵家史苑

(第三辑)

主办单位：军事历史研究会

主编：施渡桥

副主编：王式金 程金明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国防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9.125印张 234千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21—416—8/E·333

定价：4.90元

PDG

前　　言

由徐向前元帅生前题名的《兵家史苑》，第三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本由军事历史研究会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军事历史论丛性书籍。本论丛今后将继续分辑出版，以适应军事历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兵家史苑》既是军事历史研究会会员发表军事历史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同时也面向军内外所有从事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广大史学爱好者，并竭诚地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兵家史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本着以史为鉴的原则，以发表中国古代、近代军事历史论文为重点，兼收中国现代和世界军事史的研究成果，从广阔的视角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中外军事的特点，探索军事历史的发展规律，为繁荣军事科学，为国防现代化贡献力量。

《兵家史苑》将突出学术性、理论性，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和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本此宗旨，来稿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观点明确，具有新意，本书即予收刊。作者的学术观点将受到充分尊重。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极其丰富的军事历史遗产，亟待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发掘、整理和研究。我们热诚希望军内外广大史学工作者、史学爱好者积极研讨，踊跃赐稿，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兵家史苑》将努力为大家服务。

《兵家史苑》编辑部

目 录

- 前言 (1)
徐向前在红军时期的军事论述 张云勋 (1)
以弱胜强的范例——兼谈徐向前的指挥艺术 乔希章 (14)
我军党委制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公方彬 蔡志强 (27)
健全党的组织 加强政治工作
——忆改造一支土匪武装的经过 梁锡光 (40)

•战争和战略问题•

- 西汉中叶有关战争问题的一场争论 黄朴民 (47)
试论赵匡胤在统一战争中的谋略运用 郭春宣 (57)
试论太平天国败亡的军事原因 张一文 (68)
太平天国初期的两次战略分歧 魏文华 (79)
捻军的流动战述评 徐松荣 (86)

•军事思想•

- 诸葛亮军事政治思想渊源刍议 逢振镐 (94)
范仲淹军事思想初探 张富祥 (104)
试论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持久战思想 尹福廷 (119)
略论孙中山的海权思想 黄良羽 (134)

•兵书研究•

- 《孙子兵法》研究述评 刘 庆 (140)
略论孙武的军事地形观 黄志贤 (154)
中国古兵书《登坛必究》述评 廖德清 (159)

《武经七书》对近现代中国军事思想
的影响 [法] 龙乐恒(165)

• 教育与训练 •

- 试论近代中国“整军御侮，将才为先”的军事
教育思想 韩晓林 俞世福(172)
冯玉祥练兵的几个特点 曹剑浪(181)

• 兵器研究 •

- 春秋战国时代冷兵器系统的迅速形成及原因 于泽民(187)
中国火器发展的若干特点初探 王兆春(198)
清前期兵器落后的原因探析 皮明勇(207)

• 筑城研究 •

- 宋代陕北军事城寨研究 吕卓民(218)

• 解放战争史研究 •

- 滇南战役的经过及胜利原因 杨继琼(230)

• 二战史研究 •

- 希特勒闪击西欧四国何以得胜 刘克俭(24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进攻作战样式浅析 刘卫国(251)

• 史料选登 •

- 中国古代的“征因为兵” 毛元佑(264)
英帝国主义者侵略西藏策划的“西姆拉会议” 邓礼峰(269)

徐向前在红军时期的军事论述

张 云 勋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徐向前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在我军创建时期，全国各个根据地的红军，逐步发展为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徐向前同志与其他同志一起，先后建立了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使开始时只有几十人的武装发展成8万余人的红四方面军，共歼敌30余万人，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时期。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武装斗争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原则，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及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徐向前同志领导红四方面军的武装斗争，既学习了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中央红军的斗争经验，又及时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并进行了理论概括，从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今天，帅星陨落，斯人已逝，但徐帅的光辉业绩和军事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不朽的。我们研究徐帅在红军时期的军事理论，对于全面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依靠人民的群众战思想

人民战争思想在我军初创时期已经提出，但在各个根据地中，一般使用的是群众战争的概念。群众战思想也是理解徐向前

军事理论的中心线索。1929年11月，时任红11军31师师长的徐向前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特区军委会主席。当时，他和31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等同志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总结了反三次“会剿”的游击战争经验。这篇文献集中地体现了群众战争的思想，强调红军作战要依托根据地人民的支持，“要尽量号召群众参加”，认为“游击战争如果不发动群众，就失去了游击战争的意义”。并提出要实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主张在发展红军力量的同时，配合地方党组织扩大人民武装，发展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三位一体的革命战争。徐向前来回忆和总结这个时期的斗争经验时说：“红军力量在于民众之中。反三次‘会剿’拖得敌人捉襟见肘，筋疲力竭，失败而归，就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①

徐向前重视依靠人民的群众战思想是一贯的。1931年，他任红4军军长时，与政委曾中生向党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写的报告中，也渗透着实行群众战的思想。报告多次强调了战争的“广大群众的基础”问题，指出他们率军南下蕲春、黄梅、广济作战的理由之一，因为当地已经“发动了群众的游击战争”，“当地群众革命情绪俨如武汉时期”，地方工作与群众武装都有极大进展。报告还特别指出：“我们深深认识中央地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②。把广大群众看作我军的基本阵地和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这是唯物史观关于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在战争领域中的体现，也说明了他们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

徐向前的实行群众战的思想，更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军事实践中。例如，他在指挥历次重大战役战斗时，都十分重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使红军作战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由于他和许多领导同志都十分重视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同红军一道作战，因而

使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有了很大发展。鄂豫皖和川陕两个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曾分别发展到20余万人和9万多人，对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主力红军的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1933年川陕根据地的反“六路围攻”战役，就是实行依靠人民的群众战思想的光辉体现。战争开始前，根据地掀起参军参战，扩大地方武装，组织运输大军，构筑防御工事的热潮。战争进程中，实现了全民军事化，9万多地方武装成了红军作战的得力助手，数十万运输大军成了前线和后方一体化的血脉。徐向前把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与配合看作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根本原因，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没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作后盾，我们打赢这场战争，简直是难以想象的。”^③正是在人民战争的思想指导下，徐向前提出了一系列“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离开了这一思想基础，我们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他所提出的战略战术和卓越的指挥艺术。

二、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的游击战思想

红军的作战形式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在开始阶段，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红军只能实行游击战。徐向前同志正是在建立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中，运筹自如，智勇兼备，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与党代表一起拟定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就是这个时期游击战争的经验总结。其中提出了游击战的7条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7条原则把集中与分散、军队与群众、知兵与用兵、进与退、打与走、扰敌与击敌、攻击与防御辩证地统一起来。

来，体现了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红军主力、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观点则是这7条原则的思想基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正如徐向前同志在回忆这7条原则的形成过程时所说的：“实践出真知”。“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它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提炼、概括和总结。”

当时，敌强我弱，形势逼人。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就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由于红军人少武器差，打大仗不行，要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7条原则就是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制定的。徐向前特别强调要处理好虚实、强弱关系，认为实行这7条原则的关键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也好，跑也好，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都离不开这一点”。^④他当时提出的突袭、伏击、奔袭、夜袭等战法，也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这7条原则有力地指导了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它是一个良好的起点。红四方面军后来逐步形成的各种战略战术，可以说都是以这7条原则为基础不断丰富发展的。1930年，红11军的3个师已发展到2000余人，合编为红1军后，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6月，他利用军阀在中原地区混战之机，率领红1师800余人出击京汉铁路，共歼敌1000余人，接着奔袭孝感花园车站，歼敌一个团共1400余人。红1师由800余人迅速发展到3000余人。这些战斗，使红军的作战形式开始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方向发展。红军游击战术由原来的夜间袭击、消灭小股分散的敌人，发展到夜间运动，远距离奔袭，拂晓攻击，天亮后解决战斗，并能整营整团地消灭敌人。而这些战法正是在7条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红军的作战形式虽然不断变化，但游击战始终是处于敌强我弱的红军的一种重要的作战形式。直到1933年8月，川陕根据地

还曾专门召开地方武装代表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与此同时，红军刊物上还发表了曾中生的《游击战争的要诀》，对游击战争的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文中指出：“游击战争是用少数部队，采避实就虚，飘忽无常，随机制敌的战术”。其基本思想是和徐向前等同志提出的游击战争原则一脉相承的。

当时，曾中生由于受到张国焘的排斥打击，已不担负实际的军事指挥工作，就致力于红军战略战术的理论研究，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渗透着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著作，在红军内部传播，使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徐向前同志由于领导工作繁忙，这个时期写的著作不多，但他直接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作战实践，则是曾中生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可以说，曾中生的军事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徐向前等同志的军事实践和指挥艺术的理论概括。

三、飘忽灵活的运动战思想

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共1.2万余人合编为红4军时，任军参谋长的徐向前等同志就适时地提出了围点打援，诱敌伏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的作战指导思想，比较自觉地由第一次反“围剿”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取得了磨角楼、李家寨、双桥镇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先后共歼敌1.5万余人，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200万，红军也发展到1.5万余人。这些战斗，标志着红军的基本作战形式已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徐向前来在总结反第一次“围剿”的经验时指出：“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致胜的基本作战形式。”当时，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

“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红军是从游击战起家的，游击战是一种低级的非正规的运动作战的形式。因此，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很自然的。与运动战相适应，其战术必然也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远距离奔袭、奇袭；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围点打援，运动歼敌；正面突击，两翼包抄；近战夜战等等，已发展为红军的主要战术手段。”^⑥正是采用了这些符合实际的运动战战术，红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31年5月，徐向前等指挥红军采取了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仅用个把月时间，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先后共歼敌5000余人。7月，徐向前任军长后，又和政委曾中生一起抵制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限令红军在一月之内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的左倾冒险主张，率军南下至敌守备比较薄弱的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实行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通过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配合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外线出击决策，红4军南下仅一个月时间，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4座县城，歼敌7个多团，俘敌5000余人，威逼黄梅、武穴，震动九江、武汉，从而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兵力，较好地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1年11月，红4军与红25军共3万余人合编为红四方面军，标志着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总指挥徐向前率领红军主力，采取集中兵力、外线出击、围点打援、各个歼敌的方针，忽北忽南、忽东忽西地流动作战，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进攻战役，取得了歼敌40个团共6万余人、缴枪4万余支的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第三次“围剿”计划，使红军发展到4万人。这四次战役，打出了红军的威风，表明了红军的作战形式又有了新的变化，已由游击战、运动战相结合发展到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相互配合。这四次战役也充分显示了徐向前

卓越的指挥才能。他在指挥中广泛地运用了“围点打援”战术，创造了以少胜多，大规模歼敌的奇迹，使红军在作战规模、作战形式，战役的组织指挥和战术的运用上都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

四、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思想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方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概念，但它所进行的历次反“围剿”作战都体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徐向前同志曾多次指挥红军进行外线进攻的运动战，这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并不矛盾，因为战役战斗上的外线进攻战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其目的在于利用有利时机，争取主动，打破敌人的“围剿”。正如他在回顾红军胜利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计划的原因时所指出的：“‘围剿’反‘围剿’的不断反复，是我国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是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基本方针。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容在一定条件下，用积极进攻手段，事先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呢？当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防御和进攻，要看条件。条件允许，对我有利，‘先发制人’，进攻歼敌，何乐而不为！在战争问题上，最要不得机械论；机械论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招致战机的丧失，战争的失败。”^⑥这一论述，既强调了应重视客观条件，又反对了机械论观点，和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1932年，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得到了更为明确和集中的体现。红四方面军在他的指挥下，从当地的地形特点和敌我情况等条件出发，实行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创造了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逐步“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反围攻战法，从而有效地粉碎了敌人步步为营、持久围攻的战法，在反围攻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1933年2月至6月，针对四川军阀田颂尧纠集38个团的“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首次采用了这种战法，亦即当优势的敌人多路大举围攻时，红军选择有利地形，依托山隘、险路、密林，构筑坚固工事，以部分兵力据险扼守、节节防御，逐步向心退却，在防御中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待大量消耗和疲惫敌人之后，即集中兵力实施总反攻，进行大纵深迂回包围，全歼深入根据地的敌人。红军采用这种战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歼敌2.4万余人。接着，又发起了三次进攻战役，巩固和发展了胜利成果。

同年6月，徐向前主持召开了木门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并就作战和建军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论述了反围攻胜利的意义，肯定了在敌强我弱和川北山高林密、道狭隘多，易守难攻的条件下，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并对川军的作战特点、我军的战术运用和指挥艺术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后来，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情况时也指出：“导致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则是战略方针适应了新情况。”“反三路围攻，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收紧阵地是为了待机反攻，与敌决战。因之，逐步收紧阵地与向心退却的过程，也就是为最后的反攻决战积极创造条件的过程。”他还强调指出：“指导战争，驾驭战争，一刻也不容忽视地形、民情、敌情、我力，不能离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⑦

1933年12月至1934年10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徐向前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更为突出的表现和进一步丰富发展。当时，刘湘纠集四川大小军阀140多个团共20多万人，向川陕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面对严峻形势，徐向前等抵制了张国焘主张继续出击，“不停顿地进攻”的错误意见，命令红军及时由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根据敌众我寡、敌

强我弱的情况，方面军领导决定继续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并分为东西两线配置兵力，由徐向前直接担任主要作战方向的东线指挥。战役开始后，敌军进行了四期进攻，我军经过了四期收紧阵地，两次反击战，最后在万源实行决战防御，并以敌人的弱点青龙观为突破口，转入总反攻，从而粉碎了“六路围攻”，共毙伤敌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红军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川陕根据地发展到500万人口，4.2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恢复了根据地鼎盛时期的辖区。

1934年11月，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作战经验，指出：敌人对付红军的办法是，进攻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多路“围攻”，分进合击；防御时梯次配置，固守堡垒，沿线封锁，反动游击。我们对付敌人“围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收紧阵地，诱敌深入，重点突破，并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进攻。在战术上，集中兵力，形成拳头，以各个击破对付敌人的分进合击；以近战夜袭的特长打破敌人的攻防，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⑧后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更系统地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认为“在川陕边，要粉碎敌人步步为营、分进合击、持久围攻的战略战术，上乘的方法，不是主力跳出外线，待机破敌；也不是内线‘飘忽’，运动歼敌；而是逐步收紧阵地，实行决战防御。”^⑨

徐向前等提出的以逐步收紧阵地为特点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一个新的创造，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一个重要贡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⑩这里，把“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提到了战争一般规律的高度。

五、加强战斗作风建设的思想

徐向前十分重视部队的战斗作风建设，认为“作风就是战斗力”，一支革命军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他把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并分别作了具体阐述：“狠”，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就是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要有一股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的狠劲。“硬”，是指战役战斗处在严重、惨烈、危急的时刻，部队要挺得住，有过得硬的后劲，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快”，是指无论是“走”还是“打”，都要行动神速，争取主动。每战必须以快制敌，在集中兵力、开进战场、兵力展开、抢占有利地势、扫清外围据点、断敌退路、突破缺口、分割穿插、扩张战果、追歼逃敌等各个环节上，都要迅速果断，争取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猛”，是指要有“进若锋矢，战若雷霆”的勇猛作风。它既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而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活”，即灵活机动性，“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

部队战斗作风的形成，与指挥员的作风素养、指挥艺术有很大关系。徐向前本人的军事实践就很好地体现了红军的战斗作风，并显示出卓越的指挥艺术。例如，他指挥战斗，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经常亲自带领干部勘察地形，访问老乡，不弄清情况不休息，努力做到知己知彼。他勇敢沉着，指挥位置尽量靠前，以便及时判断敌情，实施正确的指挥。他指挥果断，一旦下了决心，从不轻易动摇，经常强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硬着头皮打”。

他注意充分发挥我军夜战、近战的特长，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出奇制胜，以弱胜强。他指挥作战，强调一个“实”字，一个“活”字，即符合实际，灵活多变。这两点又突出地体现在兵力的使用上。他善于集中使用兵力，把钢用到刀刃上。在鄂豫皖时期，他就注意集中兵力，“围点打援”。在川陕根据地，他对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为阵之法，在于分合”，兵力的分散和集中，保存和使用，要“因时因地因敌因己制宜”，要保持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不能单纯从数量上打算盘，做文章，还应着眼于部队的素质和特长。正是这种既“实”且“活”，适时集中和分散兵力的指挥艺术，赢得了反围攻作战的胜利。

养成良好的战斗作风，必须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徐向前十分重视训练工作，认为打仗是建筑在练好兵的基础上的。他根据红军当时所处的情况，采取了战教合一，边打边训的方针，尽量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短期整训。例如，1933年反“三路围攻”以后，部队中的新兵数量大增，而敌人一时尚难组织新的“围攻”。针对这种情况，全军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大练兵运动。徐向前提出练兵至少应包括：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习行军，五练作风。对中高级指挥员还要求学习军事理论，提高指挥能力。他还根据川北的地形特点、作战对象和我军的武器装备，制定了训练大纲，突出了基本技术、山地战斗、夜间战斗、干部的组织指挥等重点项目。同时，有意识地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加强专长训练，培养一批各具进攻、防御、夜摸、追击等战术特长的“拳头”师团。这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坚持人民军队的建军治军思想

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建设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坚强的人民军队。徐向前不仅精心研究军事指挥问题，而且十分重视人民